

上海市徐匯區政協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

慶祝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四十周年

第二輯

徐匯文史資料選輯

前 言

迎“三个”四十周年，忆往昔峥嵘岁月。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中国人民前赴后继、艰苦卓绝、历经沧桑，推翻了压在人民头上的三座大山，取得了人民革命斗争的伟大胜利。欣逢蛇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新政协诞生、上海解放四十周年纪念日。为纪念这些喜庆之日，我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专门编辑出版这个专辑，以示庆祝纪念！

这个专辑收入了徐汇区(包括当年的常熟区、上海县的二个镇)解放前夕的地下斗争，反映黎明前的战斗；民主党派人士为新中国的解放贡献自己的力量；解放初期本区接管工作斗争；粮食战线的斗争特写；以及工商业界抗美援朝组织活动；还有民主党派人士的随感及其他。内容翔实而生动，读来倍感亲切。

当年，我区人民在党的领导下，为打倒蒋家王朝迎接解放进行了艰苦顽强的斗争，压在三座大山下的劳苦大众终于争得了自由民主的权利，作了主人。

在欢庆伟大节日的日子里，不要忘记过去，不要忘记前辈为革命胜利而献身。把革命斗争真实的史料记录下来，传之后代，是我们应尽之责。这正是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我们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加强国情教育、社会主义教育、爱国主义教育、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教育，职业道德社会公德教育和法制教育等等，是极好的政治教材。我们把它奉献给大家，希望大家能珍视它，运用它。更希望大家都来关心我

区的文史工作，把翔实、丰富的史料真实纪录下来，为上海的历史宝库增添内容和光彩。

在本专辑出版发行之际，我们谨对各位撰稿人表示衷心的感谢，对本书出版工作给予支持的各兄弟单位及科技情报所印刷厂的领导和同志们致以衷心的谢意。由于我们组稿时间较短，有一定时限，组稿的面还不够宽，许多精彩的内容未能收集到，深感遗憾！好在来日方长，希望热心的读者和关心文史工作的同志们都来支持我们的工作，为本区文史组稿、撰稿工作做出新的贡献。

上海市徐汇区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
一九八九年八月

目 录

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传统	孙祥珍(1)
为迎接黎明而斗争——记龙华兵工厂的地下斗争	应同声 史逸才供稿(6)
战胜黑暗迎光明——记美亚九厂地下党活动	徐松樵供稿(15)
黎明前的战斗	许生华(19)
追求光明，迎接解放	胡珮芬(24)
在迎接解放的日子里	干叔涵(28)
常熟区接管记	范征夫(31)
回忆接管徐汇区	秦永昌(37)
接管国民党常熟警察分局	徐汇公安分局办公室公安史小组供稿(41)
接管国民党徐家汇警察分局	徐汇公安分局办公室公安史小组供稿(43)
打击粮食投机商	张颂芳(46)
记徐汇区工商界抗美援朝行动委员会	沈 壑(49)
温暖的祖国	邓金性(51)
传家黄金投资记	季震元(55)

难忘的“神仙会”.....	陈育三 沈荣森(62)
徐汇网球场的变化.....	马 曙(66)
诗花——在徐汇区开放.....	张方仁(69)
上海解放四十周年随感.....	沈振家(73)

封二、封三资料均由徐汇区档案馆提供

继承先烈遗志 发扬革命传统

孙祥珍

今年欣逢上海解放四十周年，作为一名当年参加过淞沪战役的老战士，我忆往事，心潮澎湃，抚今思昔，不由再次深沉地缅怀那些为解放上海而英勇牺牲，长眠九泉的亲密战友；也一再告诫自己：要继承先烈遗志，发扬革命传统，保持艰苦奋斗、英勇顽强的战斗精神，为建设上海振兴上海而继续贡献自己的力量。

我出生于山东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有过讨饭、住破庙的童年生活。为推翻三座大山，求得翻身解放，1944年参加革命工作，1946年加入了人民军队。经历了济南战役、淮海战役和渡江战役，以及解放上海的淞沪战役。在战火的考验中，由一名战士提升为班长、排长和副指导员。

解放上海的战役实际上是在5月12日打响的。我所在的三野九兵团第三十三军九十九师自渡江追歼蒋军后，进驻在浙江吴兴东南新兴港市。5月10日接到命令，向上海开发参加淞沪战役。我当时任九十九师二九六团一营机炮连副指导员。我们机炮连配有4挺马克辛重机枪，4门六〇炮。每挺重机枪架子重70斤，枪筒重40斤，还配备两个基数(5000发)的子弹。这些，全靠战士们身背肩扛。时值江南梅雨季节，道路泥泞，队伍日夜急行军，几乎人人摔跤。我作为副指导员，奔前跑后，既要及时了解情况，进行鼓动，还忙着照顾、帮助体弱伤病的战士扛

武器、背粮袋。有一夜，足足摔了23个跟斗。就这样一路途经平望、吴江、苏州、昆山、嘉定，于16日拂晓接替二十九军八十七师，进入该师于14日攻克的月浦镇南25.32高地以南的阵地。我师共有二九五、二九六、二九七三个团，其中二九七团接替最南边的张宅阵地，受命攻打敌曹家宅、尹家宅阵地；我所在的二九六团在其左翼，进入包家宅西北21.7高地，构筑工事，防敌反扑；二九五团则在最北面，与月浦镇东南之敌保持火力战斗，并作好防敌反击和主动出击的准备。淞沪战役是面对有坚固设防的大城市的一场攻坚战。当时淞沪地区守敌有八个军，二十五个师，还有海、空军共二十余万人，凭借四千余个钢筋混凝土永久型工事和大量土木工事，在淞沪地区形成外围阵地、主阵地和核心阵地。主阵地自月浦至龙华。其间有守敌六个军，二十个师，并配有上百辆坦克和装甲车。在上海战役打响的第三天即5月15日，敌军还从江湾抽调了一个军和一个师，加强月浦以东一线的防守。5月17日，蒋介石还乘军舰到吴淞口外亲自督战，令各线蒋军死命扼守，妄图保住吴淞、宝山，确保上海退路。所以，我们所经历的淞沪战役中的这场月浦争夺战，是十分激烈而残酷的。就拿我所在的二九六团坚守21.7高地，粉碎敌人几次疯狂的反扑来说，可谓殊死搏斗，惊心动魄。当我团进入21.7高地后，由我们一营承担防守高地的重任，一、三连扎在第一线，二连为营预备队。我们机炮连则为一、三连各配属一挺重机枪。18日凌晨，我正在值班，发现约有一、两个排的敌人乘夜色掩护，偷偷摸摸欲逼近我前沿阵地右侧，伺机偷袭我营部。我立即向营长单勇汇报。单营长命令我：用重机枪狠狠地打！于是开始了高地的第一次反击战。此时天已拂晓，敌一个步兵营在天上飞机、地上战车的掩护下，向我们发起攻击。当敌人距离我一营指挥所仅100米的时候，单

营长命令二连拿出一个排反击敌人。二连副连长封九友、排长李克生当即带领一个排冲杀出击，把敌人打了回去，击毙、击伤敌二十余人、俘敌十余名。敌人第一次反扑被粉碎后，又于21日早晨，以更大的规模卷土重来。先是重炮猛轰，然后在五架飞机，四辆坦克的掩护下，以一个营的兵力分三路向我营一、三连阵地结合部扑来。经过一小时激战，一连大部分伤亡，只剩三十余人，连长也头部负伤被人背了下来。三连连长耳朵被震聋。后我前沿阵地一下被突破口子，敌人占领了一段约四十多米长的壕沟。一、三连全体同志奋力反击，在子弹大部打光、手榴弹掷尽的紧急情况下，用刺刀、枪托等与敌人拼搏。一连副连长葛振东威猛无比，接连挑死四个敌人，自己也英勇牺牲。我们机炮连配属在一、三连的一、二班两挺重机枪也被敌人炮火炸毁，人员伤亡过半，剩下的战士也拿起步枪与敌人拼杀。五班的重机枪因在前沿发挥猛烈的火力给敌人以重创，故被敌视为眼中钉、肉中刺，首先成为炮击的目标，掩体被炸，机枪遭毁，人员大部伤亡。五班长头部被炸阵亡，副班长小杨右肘骨头被炸断，仍不愿包扎而拼死相搏；二排长张文昌头部受伤，血流满面，昏死过去，大家以为他已“光荣”了，背下来与其他烈士的遗体放在一起等待安置，孰料两小时后他苏醒过来，又爬上前沿指挥战斗。我发现他后说：“你没死啊？”，他说：“我还够本哩！”充分显示出与敌人血战到底、不畏牺牲的革命英雄主义气概。当敌人在突破我一、三连阵地结合部、占领了那段战壕时，团长王绍棠当机立断，命令二连连长曲春元带领四个班要坚决把敌人反击下去，夺回阵地。那时在我团流行一句顺口溜，叫“钢八连、铁五连、金钢钻子的小二连”，二连的战斗力是可想而知的。曲春元接受命令后，在我们机炮连唯一剩下的一挺重机枪火力的掩护下，率四个班的战士，如猛虎

出山一般冲向敌人。先是甩出一批手榴弹，接着与敌人拼刺刀。经过半小时的血战，夺回了阵地，而他带领的四个班也伤亡过半。九班长孙学商在与敌面对面射击中，打死四个敌人，自己也不幸中弹，抱着冲锋枪倒下。二连夺回阵地后考虑到敌人必将再次反扑，立即从后面搬上几大箱手榴弹，严阵以待。果然不出两小时，敌军又组织了一批敢死队，以坦克开路，向我们反扑。那坦克驰至我前沿阵地一百米停下，以炮火向我方猛轰。这时，我方火箭筒上仅剩一发炮弹。曲春元告诫火箭筒手不要轻易打，要打必须打在刀刃上——打中敌人的头一辆坦克。在他指挥下，火箭筒手屏住气，稳准狠地击发，火箭弹击断了敌人最前面的那辆坦克的履带，其余坦克见势不妙，转头就逃。我们乘势组织反击，给敌人以大量杀伤，共打死敌人一百多，俘虏二十多。两次反击后，敌人还几次试图把那辆被打断履带的坦克抢回去，于是我团部下令将它炸毁。二连二班战士赵福来接受任务后，在火力掩护下，抱着二十斤重的炸药包，爬上敌坦克，为不让炸药包从坦克上滚下来，他用身子压住炸药包，拉了导火索，在冲天火光中，坦克被炸毁，他也壮烈牺牲。

以后，在5月23日夜，我军对上海发起总攻击，至25日13点，上海市区被我军占领，敌人退缩到吴淞、江湾附近。26日凌晨2点，我们又接上级命令，集中主力大胆地向敌人纵深插去。26日我们二九六、二九七团与二十九军一部打入了宝山城，二九五团则直插吴淞，并率先进入吴淞镇。

在解放上海的战役中，尤其在月浦，宝山一带与敌人展开的极其残酷的攻击战、争夺战中，我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仅我三十三军就阵亡228人，负伤1275人。我们机炮连，原来一百来号人，剩下仅四十来人。当到达吴淞时，我曾问六班长袁峰义他班还剩多少人？他说：“原来14个，现在只有4个，但重

机枪还在。”正由于指战员们英勇顽强，不怕牺牲，前赴后继，连续作战，终于排除千难万险，胜利完成了上级赋予的光荣任务。每当回忆往事，那历历在目的情景，总不断给我以教育，启迪我反思，激励我奋发。今天，在庆祝上海解放四十周年的日子里，我们面临着治理经济环境，整顿经济秩序，全面深化改革的形势与任务，再次回顾淞沪战役，那种吃苦耐劳、艰苦奋斗和严守纪律的革命精神，仍然深深地激励着我们。当时各方面的条件十分艰苦，先是日夜兼程、冒雨负重急行军，进入阵地后又是天上下雨，地下冒水，浸泡在泥浆积水的战壕里，坚持战斗了十余天，由于炮火封锁，还时常饿肚子。一天，我们连的炊事班长老邓冒着敌人的炮火给前沿送饭，不幸中弹，他的鲜血就洒在饭菜上。战士们为了保持战斗力，只得把血拨开而把饭吃下去，口渴了，喝不上水，就在漂着敌人尸体、血水的河浜里取水解渴。大家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憋着劲，咬着牙坚持着。而当在21.7高地打垮敌人敢死队的反扑后，面对敌人丢弃在阵地上用来收买敢死队的大量银元，我们战士没有一个眼红、手痒。以后在发起总攻，直至进入市区，指战员们都严格遵守城市接管政策和入城守则，做到秋毫无犯。5月26日，我们就是和衣睡在东大名路的人行道上。对战斗中缴获的财物则全部上缴归公，没有一个占为己有的。如二九五团副团长李廷奎经手上缴的金条、银元、手表、钢笔、眼镜等等，就装了一大卡车。今天，我们缅怀为解放上海，解放全中国，甘愿奉献自己的一切、甚至宝贵生命的革命先烈，就要学习他们的革命精神，时刻牢记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牢记在新形势下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永远保持艰苦奋斗的精神，坚持为政清廉，严守法纪，为振兴上海，振兴中华贡献自己的一切！

为迎接黎明而斗争

——记龙华兵工厂的地下斗争

应同声 史逸才供稿

龙华兵工厂(现名7315厂)，它的前身是清末李鸿章开办的江南制造局龙华分局；大革命时期，是国民党浙沪警备司令部，专门枪杀我地下党员和爱国志士；在日伪时期是日本帝国主义的宪兵队；抗日胜利国民党接收后，成为兵工厂。它是以修理枪械、大炮、坦克、改装装甲车为主的军事工厂。

国民党为了严控该厂，派了将校级军官直接领导，所有军官(包括技术人员)绝大部分是国民党员，并有警卫队和军统特务组织一稽查组。他们严密控制着全厂机要部门和监视职工的行动，不准工人集会，更不准建立工会，甚至他们认为可疑的职工的信件，都进行拆封检查。他们自认为这样就可以扼杀革命力量。然而螳臂岂能挡车，中共地下党的活动就在他们的眼皮底下展开了。

从1947年起，兵工厂工人就在龙华镇第四十民众夜校学文化。夜校的教师都是地下党员或进步青年。1948年后，龙华地区地下党组织通过夜校发展了一批工人党员，兵工厂第一个入党的是王庆恩同志。以后又发展了李烈斌，魏钩，郑贵清，应同声，孙士信，喻龙刚、史逸才、金海潮、林永康、张培其等十名党员。从此，地下党的活动便深深地插入了兵工生产部门，

为后来的反迁厂、护厂、迎接上海解放，发挥了核心领导作用。

一、反内战，反饥饿斗争

中共地下党的组织在龙华兵工厂建立后，按照上级的指示，在工人群众中广泛开展交知友活动，还鼓励工人参加龙华四十民校学文化，参加龙华镇业余青年康乐会（地下党外围组织）的文体活动。并广泛向职工宣传当时的政治形势，揭露国民党反动面目，使大家的阶级觉悟不断提高，盼解放的心情不断增长。在这基础上，地下党根据当时时局混乱，物价飞涨，职工生活困难等情况，在上级党的领导下，依靠群众，组织了反内战，反饥饿的斗争。

1948年冬，物价暴涨，投机商大量囤粮，劳动人民连配给米都买不到，怨声载道。当时，龙华镇某粮店从水路运来一批黄豆，还未卸货，就被买不到粮食的群众一抢而空，消息传来，工人们无不拍手称快。王庆恩根据党组织的指示，与地下党员商议，一致认为在厂里开展反饥饿斗争的时机已到，就利用黄豆事件发动工人向厂方作反饥饿斗争。经过两周的酝酿准备，在全厂展开了上班不干活的怠工斗争。这下可把厂方急坏了，延误军工任务，责任重大，被群众称为“皮老虎”的兵工厂“五虎将”之一副厂长孟继炎，迫于群众的压力，不得不亲自出面，对工人们说：“你们有什么要求，可派代表来谈判，不能停工影响生产……”。党组织见厂方愿谈判，就发动群众推出王庆恩、魏钧、陈芳等四个代表向厂方提出两条要求：1. 每人每月发配给米三斗；2. 增发解散费（蒋介石在淮海战役失败后，工厂决定迁台湾，凡不去台者一律解雇）。厂方怕触犯众怒，影响军工生产，被迫同意我们的要求。首战告捷，工人们看到了团结起来的力量，鼓舞了斗志。

地下党还发动了破坏军工生产的反内战斗争。1948年下半年，战犯汤恩伯盘居上海，筹括军用物资和装备，命令龙华兵工厂改装一批装甲车运往淮海战场，来支撑淮海战役节节失败的残局。地下党得悉后，立即发动工人群众展开斗争，利用装甲车运走之前必须检查整理的机会，将车上的“车油管”换下，“配电盘”拆坏，“变压器”线路拉松动，使这批装甲车开到南京过浦口，就成了象喷过“滴滴涕”的臭虫一样，爬不动了。这年冬天奇寒，有八辆要改装成装甲车的美制十轮大卡车停放在露天车场。军官韩世昌命技工史逸才（地下党员）在下班前将车场上所有的车辆水箱里的水放掉，以防冻坏。史逸才带了几名工人放水，轮到这八辆大卡车时，下班时间到了。警卫规定下班后车场必须上锁，工人必须离开。这时放水工人明知韩早已下班回家，假装急着去找韩，离开了车场。第二天八辆车的引擎全部冻裂。史就主动找韩说：下班前找不到你，工人只好关门下班。韩因自己有责任，只好托人求情，打报告请求宽处，被副厂长孟继炎痛骂一顿，不了了之。

1949年3月，国民党反动统治已摇摇欲坠，物价暴涨，工人一个月的工资只能买一斗米，金元券等于废纸。上级党组织指示，抓住时机开展第二次反饥饿斗争，破坏国民党军工生产经过酝酿，利用发工资的机会，发动群众向厂方提出两个条件：1. 增发每人七块银元以维持生活；2. 工资折成米价、按米价发。并派代表李烈斌、郑贵清等四人向厂方交涉。厂方一再拒绝，最后被任务所迫，才勉强同意每人增发三块银元。通过这次斗争，使群众进一步看清了反动派不顾工人死活的残酷本性。大采取“上班不做工，上面来人动一动”的磨洋工方式同厂方家进行斗争，拖延军工生产，支援解放军早日渡江。

二、反迁厂斗争

1948年11月，国民党妄图在溃逃之前将上海重要工厂的设备迁走，决定把龙华兵工厂的设备和人员分三批迁往台湾。消息传开后，职工情绪波动很大，厂内一片混乱。

根据上级党组织的指示，地下党领导群众展开了反迁厂的斗争。首先由地下党员分头在工人中间开展不去台湾的宣传活动，经过深入发动，多数职工不愿去台，有些技职人员在上海有亲友的，也都自找出路不愿去台。因此，无论厂方如何动员，强行命令，不愿去台的人越来越多，有的虽已领了去台的安家费，打好行李准备动身了，听了我们的宣传后，也改变主意，躲起来了。大家不愿去台，对拆运机器抱消极态度，使拆运速度非常缓慢。与此同时，地下党还将厂内国民党官员和技职人员情况，向龙华地区地下党领导人石敬诚同志汇报，运用厂外力量写宣传、警告信件，通过市区或外地寄给他们，向他们宣传形势、指明前途，交待保护好工厂设备的任务，并警告他们违者将自讨苦吃。迫使他们在迁厂问题上犹豫不决，不敢轻举妄动，有些高级技职人员也因此留了下来。

1949年2月，先行去台的厂长李国琛从台湾发来“十万火急”的急电，责令留守处要尽快将三百辆水陆两用战车拆装运台。留守处的官员们知道要靠留守工人去拆装是完不成任务的，就采取包工给私商的办法，合同以二个月为限，逾期要罚款。私商雇用了200多名临时工，厂方派2名军官，一名技工监拆(这名技工是我地下党员史逸才同志)。地下党就指派郑贵清同志去做临时工，会同史逸才进行反拆装斗争。郑贵清团结临时工，提出一块银元工资太低要增加一元的要求，私商不答应就罢工。拖了几天，私商怕逾期罚款只好答应。而罢工后工人情绪松懈，拆车进度很慢。史逸才又利用监拆身份，以天雨罢工、技术精度等原因证明需要延期。因此，直到上海解放，除

了一辆作为样品，运往台湾外，余下299辆都未运走，充实了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早在1948年底，国民党的迁厂阴谋达不到预期目的，恼羞成怒，以反对迁厂，不愿去台湾为借口，把王庆恩、魏钩、郑贵清、陈芳等一批工人解雇出厂。上级党为了保存实力，坚持斗争，决定由王庆恩、郑贵清等出面在龙华镇开设“青年车行”，以修理自行车为掩护，作为党在龙华地区的联络站，实际上也是兵工厂地下斗争的厂外指挥所。青年车行的招牌是石敬诚同志连夜书写的。郑贵清等同志经常为党内发送文件、资料和宣传品，还用踏车搭客的名义护送党的领导往返市区工作。平时，还担负一部份地下斗争中的另星开支。上海解放时，青年车行用平时积累下来准备渡困难用的十六担大米，全部支援了护厂队和区人民保安队。

三、护厂斗争

1949年四月上旬，解放军即将横渡长江，解放南京、上海。龙华地下党负责人石敬诚同志在石家巷召集部份地下党员布置任务：要求工厂迅速组织护厂队，保护工厂不受破坏，配合解放军迎接上海解放。李烈斌同志回厂组织党员深入到群众中去，物色了宫锡堂、董树奎、魏守义、王炳南、高东海、徐益明、林富德、蔡善怀等20多名工人参加护厂队。并趁厂警卫队因部份人员去台湾急需充实人员之机，派魏守义、王炳南二人打入警卫队，隐蔽下来，等待时机，配合护厂活动。

5月24日上午九时许，兵工厂已隐约可以听到解放上海的枪炮声，修枪所工人张其生的脚跟忽被一枚流弹打伤，厂里国民党官员混乱万分，纷纷跳上汽车往市中心逃窜。下午，枪炮声更响了。警卫队的卫兵也慌得不断去问队长怎么办，队长徐亚光冷汗直冒，不断用电话向上级请示撤不撤？一直到下午四点多，才得到警卫队全部撤出的命令，徐亚光放下电话连走带

跑通知班排长集合警卫队准备撤退。负责监视警卫队活动的应同声同志立即向李烈斌同志作了汇报。但这时龙华路上全是国民党败兵，百姓不能通行，向上级汇报请示已不可能，李烈斌同志当机立断，召集在厂的地下党员孙士信、郑贵清等紧急商议，分析了警卫队的三种情况：一是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的，如班排长等占1/3不到；二是不属队长嫡系，常受训斥，内心不想跟国民党走，但又怕共产党而犹豫不决的也占1/3；三是余下的1/3士兵，他们家在龙华又有家属，舍不得离家的。经过分析，决定先将汽车司机隐藏起来，无人开车，拖住警卫队。并立即分头在有家属的卫兵中开展活动，争取中间孤立顽固分子。同时通知护厂队立即到厂大门口集合，听从指挥、准备行动。这时徐亚光急着要撤，但汽车没人开，有些卫兵也迟迟不来，正大发雷霆时，护厂队员已赶来对徐说：“警卫队是保护工厂安全的，你们不能走。”并针对士兵中怕共产党因而想走的心理，纷纷拿出工作衣给士兵们换上，士兵们也不管队长同意否，纷纷脱下军衣，换上工作服。徐亚光见大势已去，自己也脱下军衣换上工作衣。接着，我们就向徐亚光提出，大门口外面都是国民党败退的官兵，不能没有人站岗，要求由换上警卫队员军装的工人来站岗。徐亚光在不得已的情况下给了二支步枪，一支冲锋枪，由护厂队员来站岗了。到5时多，徐亚光忽然又召集班排长到他的办公室开会。我们怕情况有变，防止他们狗急跳墙，立即决定缴枪护厂，由郑贵清同志负责切断电话线，喻龙刚、林永康、徐益明、官锡堂、董树奎等同志守在警卫队办公室门外，李烈斌、孙士信、应同声等同志利用三支站岗用的枪冲进队长办公室。当我们冲进办公室大喝“不许动”时，队长和班、排长们还未醒悟过来，正在举手惊呆之际，外面的护厂队员就一拥而上，缴了班、排长手中的枪和已集中在办公室

内墙边靠着的步枪、冲锋枪、卡宾枪和床底下的机枪。他们以为是解放军来了。我们命令他们就地待命，不准乱动，并在办公室外布置了武装岗哨。经清点缴获的枪支，发现与事先掌握的42支还差三支卡宾枪和一支手枪。经王炳南、魏守义查找，在汽车组墙角找到了三支卡宾枪。还有一支手枪肯定是徐亚光暗藏起来了。李烈斌、孙士信、郑贵清三人就去找当天的值星官熊家兴，通过他去做徐亚光的工作，要徐把一支手枪交出来。但徐亚光仍是狡猾顽抗，不肯交出来。这时按计划埋伏在窗外的孙士信用冲锋枪把窗玻璃敲碎，对准徐亚光说：“把枪交出来，不交打死你”。徐双眼看着枪口，惊慌地举起发抖的双手说：“我交、我交”。原来他把一支左轮手枪藏在枕头芯里。兵工厂的地下党带领群众胜利地完成了夺取武器、武装护厂的任务。

晚上八时许，厂内几个地下党员正在商量如何向上级汇报，也想了解外面的情况。魏钧带着联络员吴继华来了，他说解放军已到了漕河泾，正在向龙华挺进，大家听到这个喜讯，兴奋极了，向联络员汇报了厂内情况。魏钧提出晚上要加强巡逻，在最后阶段保护好工厂，还察看了布岗情况，接着李烈斌随他俩一起到龙华镇，向上级汇报后，又回厂坚持斗争。晚上十一点，李烈斌不见有人来厂，心里很急，安排好护厂任务后与孙士信二人带了卡宾枪又到龙华镇去联系。这时解放军已到龙华，孙、李二人被埋伏在桥头的解放军缴了械，并押送到临时联络站（王庆恩家）。在油灯下，王庆恩一看是李、孙二人，才消除了误会。解放军一位营长也在联络站，当即询问了兵工厂情况，并提出要到厂里去看看。李烈斌带他们到了厂里，护厂的同志第一次见到解放军，十分高兴，热烈鼓掌。当解放军在厂里巡视一周后，认为厂里有枪枝弹药和二千多发炮弹，如有特务破坏或敌机轰炸，在厂里的职工和家属有很大的危险，